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 主编 黄达

分报告二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

杨瑞龙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 主编 黄达

分报告二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

杨瑞龙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杨瑞龙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黄达主编)

ISBN 978-7-300-08608-8

I. 全...

II. 杨...

III. 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408 号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主编 黄达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杨瑞龙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8.2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3 00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报告的核心是解释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特别关注制度变革、开放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经济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等基本因素的伴随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开放战略，根据中国经济中基本约束条件的变化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新特征调整中国的开放战略。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03JZD0013)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
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首席专家：黄达

课题组成员：陈 共 陈雨露 吴晓求
杨瑞龙 郭庆旺 张 杰

策划编辑 王克方
责任编辑 商晓辉
封面设计 李亚莉
版式设计 赵星华

目 录

第 1 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1
1.1 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开放度的拓展	1
1.2 对外开放、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3
1.3 产权制度—经济增长的中国传导机制及其潜在的问题.....	26
1.4 全方位开放条件下的产权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38
1.5 结论与政策建议.....	48
第 2 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模式选择	53
2.1 “后起者优势”与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54
2.2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制度条件.....	55
2.3 政府主导与市场导向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道路比较.....	57
2.4 深化改革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60
第 3 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工业化、外贸与经济增长	64
3.1 导论.....	64
3.2 中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66
3.3 外贸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74
3.4 结论与政策含义.....	78

第4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79
4.1 导论	79
4.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产业、技术和 业绩	80
4.3 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	86
4.4 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	88
4.5 结论与政策含义	93
第5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贸易开放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98
5.1 导论	98
5.2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理论逻辑和分析范式的演变	99
5.3 全球化—经济增长联系的中国案例分析	105
5.4 结论与政策含义	116
第6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	118
6.1 导论	118
6.2 全球经济调整下中国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与结构风险	119
6.3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40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164
第7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资本流动性和中国经济增长	168
7.1 导论	168
7.2 开放、资本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理论逻辑和实证经验	169
7.3 资本流动性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74
7.4 结论与政策含义	183
第8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中国经济增长	187
8.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理论与历史	188
8.2 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与潜在的金融风险	206
8.3 开放环境下金融风险的预防和化解	212
第9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资源环境约束与中国经济增长	218
9.1 资源环境约束背景下的全球经济调整	218
9.2 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理论	226

9.3 全球产业结构与中国资源环境问题	229
9.4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增长方式	241
第10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与计量分析	246
10.1 中国经济增长的准 AK 模型	246
10.2 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248
10.3 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251
10.4 中国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	254
 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84

第 1 章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制度 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1.1 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开放度的拓展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新古典分析范式看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索罗，1965；舒尔茨，1967；丹尼尔森，1978）。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史得出，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的增长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而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乏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创新、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力增加的原因。^① 有效率的制度和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有效率的组织和制度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确立和界定人们的权利，以形成必需的激励和约束，使各种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接近，从而使人们将各种资源

^① 诺斯指出（1973）：“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自身乃是增长。”

引入导致经济增长的使用方向,才能使人们努力地进行创新、资本积累、教育投入以及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最后表现为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经济增长理论(North, 1973, 1981, 1990; Williamson, 1985)。

在转轨过程中,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进行制度的变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才能通过重新构建各种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使大量资源从无效的配置状态摆脱出来,才能减少社会的冲突和摩擦。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发展生产力”和促进增长的基础(World Bank, 1998, 1999; Stiglitz, 1999, 2000)。制度的质量以及制度质量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些观点被统称为制度—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分别由产权—经济增长理论、政治—政府—经济增长理论、社会制度—社会资本—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转轨次序—经济增长理论组成。^①

依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许多经济学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对经济制度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研究。如 Kaufmann (1999) 对治理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 Jagers 和 Gurr (1995) 对产权关系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计量研究, Hall 和 Jones (1999) 对产权清晰程度与国际经济增长差异的计量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研究。如 Helliwell (1994) 和 Barro (1996) 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 Chowdhurie-Aziz (1997) 对非精英参与政治程度与增长的计量研究。三是对社会制度(非正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如 Narayan 和 Pritchett (1997) 对坦桑尼亚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四是对综合性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它主要通过对各种制度加权后进行计量。如 Rodric (1998, 1999, 2001, 2002) 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Sachs 和 Mellinger (1998) 对资源禀赋、贸易程度以及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 Easterly 和 Levine (2002) 对地理位置、制度质量与

^① 参见罗兰:《转轨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

1.2 对外开放、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中国在过去 20 年的转轨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经济业绩，但什么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却是一个在理论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渐进的制度变革——市场化、非国有化以及对外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资本的积累，进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田国强，2000；刘伟，2001；Megginson，2001）。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各方面的质疑。萨克斯（J. Sachs）在研究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经济绩效时就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制度转轨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快速转型的产物，二元经济转型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Sachs，1994，1996）。著名经济学家波波夫（V. Popov）进一步扩展了该观点，他利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后发优势理论”指出，人们在认识转轨经济绩效中，过分地强调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改革初始条件的作用。中国和越南等国出现高速经济增长，而前苏联各国出现经济崩溃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制度变革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在于中国和越南这些国家享受了转轨的“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因为在转轨过程中，一国在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发展水平越高，原有制度以及经济水平带来的价格水平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贸易模式扭曲、专业化定位扭曲以及固定资本存量就越大，转轨成本也就越高，转轨绩效也就越差。相反，一国发展水平越低，各种扭曲以及固定资本转型带来的供给性经济崩溃的可能就越小。因此，发展水平低下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一种资本。中国经济水平的落后以及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使其存量改革的成本很低，而且可以使它把大部分财力物力用于增量改革，所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其渐进制度变迁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制度变革，而在于产业结构的发展（V. Popov，2000）。

如何认识萨克斯和波波夫的反论，不仅涉及理论上的问题，即“制

度—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发展理论的争论^①，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中国未来经济改革重心的取向——是继续以包括所有制、市场化以及开放化在内的经济制度变革为核心，还是以推动二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因此，本项研究计划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计量研究，分析出在我国转轨时期制度性因素与产业结构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回答上述争论。同时，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判断各种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指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导向。本节的第一部分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来计量检验“制度—经济增长论”和“二元经济发展论”在我国是否成立；在第二部分将利用结构计量方法，将各种制度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同时引入社会生产函数之中，计量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第三部分将根据计量结果做出理论和政策性总结和建议。^②

这些计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一是回归相关分析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跨国比较研究。它首先采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制度进行量化（一般直接引用“国际投资风险指南”、“自由之屋”“政治经济风险咨询”等国际机构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数据），然后建立多变量回归相关模型进行计量。二是虚拟变量法。该方法并不要求对制度直接进行全面量化，而是根据不同时期制度的重要性，设定制度为虚拟变量并对它进行赋值（一般为“0”、“1”）。将该虚拟变量纳入社会生产函数之中计量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残差法。该方法首先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生产函数）进行全要素生产率（TPF）计量，然后对 TPF 与相应的制度变量进行进一步计量分析。

这三种计量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陷。第一种方法的缺陷在于：（1）对制度变量进行赋值没有客观标准，大部分采用德尔菲法；（2）相关回归关

① 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具体争论，请参阅 C. P. 欧曼和 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根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一系列计量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回归法、虚拟变量法、残值法以及结构法，刘元春（2003）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回归法和结构法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章选择这两种方法从不同层次上分析制度、二元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详细计量方法请参阅刘元春（2003）。

系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虽然很多计量检验采取了格兰杰因果检验;(3)跨国比较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应用于单个国家或实际分析。第二种方法的缺陷在于:(1)虚拟变量难以真正刻画制度的作用,并且其他干扰因素也可以包含在虚拟变量之中;(2)在生产函数中的其他变量很可能是制度的函数,如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的提高本身就是制度或制度变迁引致的结果。而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无法将该因素纳入其中。第三种方法的缺陷在于:TPF 虽然与制度变量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因此,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利用上述三种方法分别进行制度—经济增长计量研究,以综合反映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2.1 回归方法

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沿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打破以往计划体系,建立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二是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通过发展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壮大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三是全面调整发展战略,通过全面改革外贸体制以及其他相应的制度措施,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代替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将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化程度(MRL)、非国有化水平(NSOW)、开放程度(ORL),其分别定义如下:

(1) 市场化程度。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已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表示。

(2) 非国有化水平。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

(3) 开放程度。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①

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模式,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元

^① 分工水平是杨小凯(1999)在研究制度—经济增长关系中最关注的变量。

经济结构性转变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将考虑二元经济模式。其经济变量是“非农化水平 (NA)”,它是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 1—1 和图 1—1 对我国 GDP 和各种制度变量进行了分析。

表 1—1 GDP 和制度变量 (单位:%)

年份	GDP	非国有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	开放程度	非农化水平
1978	100	22.37		9.80	29.5
1979	107.6	21.53		11.26	30.2
1980	116	24.03		12.62	31.3
1981	122	25.24	59.2	15.12	31.9
1982	133.3	26.64	63	14.57	31.9
1983	148.2	26.64	63.9	14.49	32.9
1984	170.9	30.91	62.9	16.75	36.0
1985	193.5	35.14	63.9	23.05	37.6
1986	209.9	37.73	64.3	25.29	39.1
1987	234.1	40.28	63.9	25.78	40.0
1988	260.5	43.21	69.7	25.60	40.6
1989	271.5	43.93	74.4	24.58	40.0
1990	283	45.39	71.7	29.98	39.9
1991	308.8	43.84	69.7	33.43	40.3
1992	352.2	48.48	68.3	34.24	41.5
1993	398.4	53.05	72.8	32.54	43.6
1994	448.7	61.96	74.6	43.59	45.7
1995	489.1	66.03	76.5	40.19	47.8
1996	536.8	71.52	77.8	35.55	49.5
1997	582.9	74.48	78.3	36.22	50.1
1998	628.4	78.43	76.5	34.28	50.2
1999	673.5	79.69	74.5	36.43	49.9
2000	729.6	77.97	73.3	43.93	50.0
2001	780.6				5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其中的 GDP 是以 1978 年为 100 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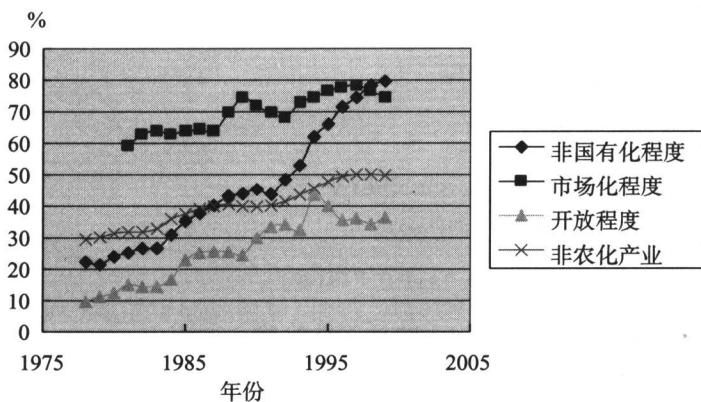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各种制度变量的变化趋势

1. 市场化程度

$$GY = A + B \times MRL$$

回归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GY = -1\,542.0 + 27.17MRL$$

$$(293.67) \quad (4.184)$$

$$R^2 = 0.70, DW = 0.468, F = 42.175$$

回归系数均通过水平 0.01 的显著性检验，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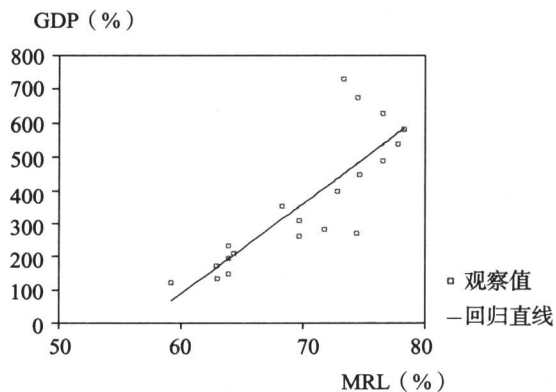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 GDP 对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结果

2. 非国有化水平

$$GY=A+B\times NSOW$$

回归得到的方程为：

$$GY=-136.11+9.856NSOW$$

$$(16.47) \quad (0.325)$$

$$R^2=0.89, DW=0.61, F=921.6$$

回归系数均通过水平 0.01 的显著性检验，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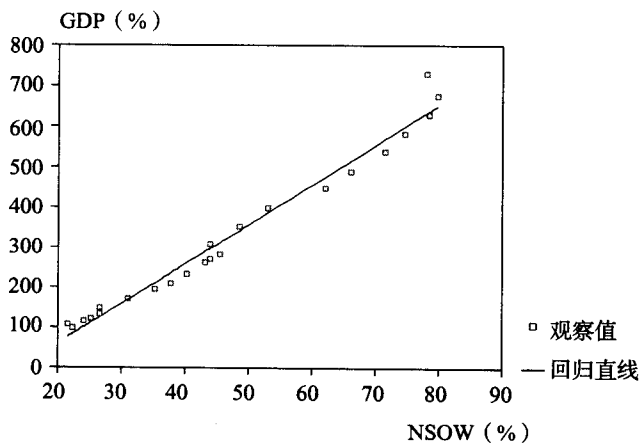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 GDP 对非国有化水平的回归结果

3. 开放程度

$$GY=A+B\times ORL$$

回归得到的方程为：

$$GY=-115.35+16.394ORL$$

$$(54.34) \quad (1.822)$$

$$R^2=0.85, DW=0.41, F=75.89$$

回归系数通过水平为 0.01 的显著性检验，见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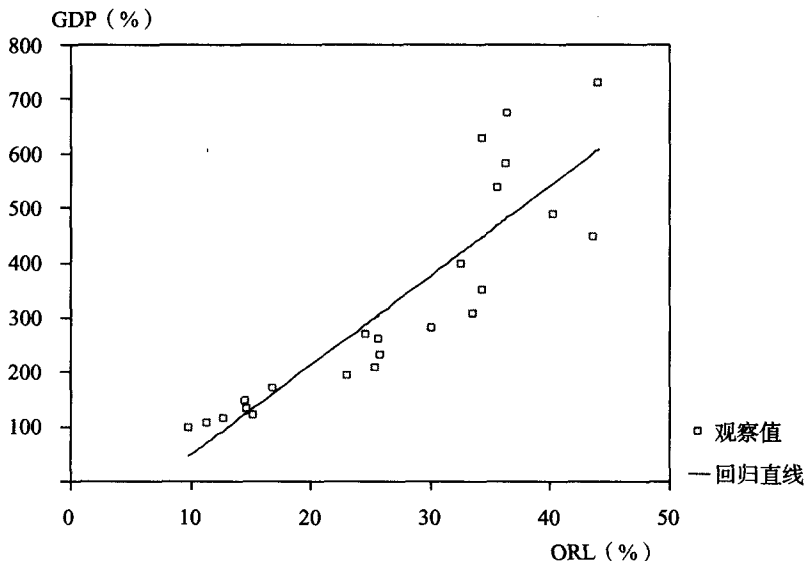


图 1—4 中国 GDP 对开放程度的回归结果

4. 综合评价模型

$$GY = A_0 + A_1 MRL + A_2 NSOW + A_3 ORL$$

回归得到的方程为：

$$GY = 167.37 - 5.784MRL + 11.562NSOW + 0.405ORL$$

$$(132.418) \quad (2.377) \quad (0.895) \quad (1.450)$$

$$R^2 = 0.991, DW = 1.10, F = 293.204$$

由于 DW 值较大，自变量之间存在比较强的自相关性。从表 1—2 中可以看到，非国有化、市场化以及开放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非常强，说明这些制度变量的变化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发展中相互作用的，因此简单利用回归方法无法表明这些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